

挣脱“同一模式”下的概念迷思

——对借鉴德国 FH 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思考

王兆义 郑友取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FH) 是德国工程人才培养的主力军, 以其人才培养特色为基础而形成的“FH 模式”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 借鉴德国 FH 模式更是成为我国许多高校尤其是地方型院校改革实践的重要着力点。在借鉴德国 FH 模式的热潮背后, 存在着迷思和误用, “模式”本身则成为同一化和标签化的辞藻。

关键词: 德国 FH; 人才培养模式; 概念迷思; 院校发展与转型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17) 06-0059-07

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 简称 FH) 是德国教育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环, 其发展历程和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受到国内教育研究者和教育改革实践者的关注, 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领域, 还是在职业教育领域, 德国 FH 模式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 “借鉴德国 FH 人才培养模式”更是屡屡见诸报头与文题。然而, 德国 FH 模式是怎样的模式? 从何而来? 这个模式是先设性的存在还是域外形成的概念? 借鉴德国 FH 人才培养模式的充分必要性怎样? 本文试结合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具体状况, 对借鉴德国 FH 人才培养模式的潮流进行一个理念层面的反思。

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基本情况

应用科学大学是指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 将其教学和科研的重心置于应用性导向 (Anwendungsorientiert) 的一种学校类型。^[1] 在名称表述上, 除了 Fachhochschule, 其他如 Hochschule,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Technische Hochschule 也属于应用科学大学的范畴, 这些学校相应的英文名称统一为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AS)。为了避免产生混淆, 本文统一以“应用科学大学 (Fachhochschule)”来指代这一类型的大学。从总体上看,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早期阶段; (2) 扩展阶段; (3) 博洛尼亚改革后的分化阶段。

传统意义上在德国只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生经过 4 年在小学的学习后, 在 10 岁左右就开始了分流。一般情况下进入综合性大学学习的条件是通过文理综合考试。其他所有的职业资质方面的培训都来自于职业教育领域。在过去, 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且没有过渡机制。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向服务业和信息社会的过渡, 职业教育以及继续教育领域的理论教学需求日益提升。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 在上世纪 20 年代,

收稿日期: 2017-04-20

作者简介: 王兆义, 男, 浙江科技学院中德工程师学院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研究中心讲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郑友取, 男, 浙江科技学院副院长, 教授,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德国经济界推动了培养有资质的产业工人的举措，这一举措在二战结束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这些产业工人应该在一定理论培训的基础上能够快速、有效地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出现了国家层面扶持的工程师学校（Ingenieurschule）、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和专科学校（Fachschule）。而如何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框架下对这些学校的证书进行认证就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于是在70年代应用科学大学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是上述的这些学校转制而成，另一方面也新建了一批应用科学大学。

1976年，应用科学大学在法律层面上被升入了大学。应用科学大学从当时的文化部序列（中小学教育事业归文化部负责）抽离出来进入了科研部序列，同时也明确了它的学术自治和教学、科研的自由。综合性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学制形式上，一方面前者大多为五年，后者四年就可以取得毕业文凭；另一方面应用科学大学的所有专业里都明确列出了两个必修的实践阶段，每个阶段持续数月，而在综合性大学的培养计划里只有一个非结构化的短期实习。

2000年前后，在博洛尼亚改革的框架下，所有的高校统一颁发学士和硕士的学位证书，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在这一层面自然就实现了同等化。从教学内容上看，应用科学大学主要侧重于应用性和实践导向，而综合性大学主要偏重于科研导向。

二、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被称为德国最年轻的大学，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主要以实践为导向（Praxisorientiert），其教学和科研的目标都是以应用为导向（Anwendungsorientiert）；在课程设置上主要以模块化教学（Modularisierung）^①为主要形式，以实现学生就业为主要目标，课程教学通常以小型的讨论课（Seminar）为主，讲座课

（Vorlesung）较少；教授资质的认定标准上除了相应的学术标准外，还需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管理机构的设置上通常是小而精悍；入学资质上学生不一定需要通过高中结业考试（Abitur），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应用科学大学学习，在德国“分流式”基础教育结构的影响下，应用科学大学的生源主要来自职业高中（Fachoberschule）、文理高中（Gymnasium）和职业文理高中（Fachgymnasium）；除此之外，学生也可凭借在相关行业领域内的职业经验作为申请进入应用科学大学就读的“敲门砖”。^[2]

三、对德国FH模式的研究和实践情况——模式化和标签化

在Fachhochschule这个概念刚刚进入我国时，被翻译为“高等专科（业）学校”，^[3]从而被等同于我国的大专或高专，这种称法甚至延续至今，^[4]而许多研究中更是将Fachhochschule与职业教育联系在一起。而在德国“高等教育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中，Fachhochschule也和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师范高校（Pädagogische Hochschule）、艺术高校（Kunsthochschule）等一起被归入了高等教育的范畴。^[5]近年来，Fachhochschule逐渐被称为“应用科技大学”、^[6]“应用科学大学”^[7]以及“应用技术大学”。^[8]

国内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的研究方面，目前尚比较集中在介绍性地对比研究方面，缺乏对其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和社会机制研究。徐理勤较早并较为集中地介绍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改革历程、^[9]改革模式^[10]以及人才培养特色。胡蕾蕾、冯理政、袁琳等人分别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制度特色、^[11]办学特色^[12]和国际化道路^[13]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K.E. Fichter^[14]和L.Jähnig^[15]从高校外部和高校内部两个不同视角讨论了应用科学大学在德国新的发展情况和改革措施，即在博洛尼亚进程下，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普遍进行的学位制度改革（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制）以及学费收费制度改革现状。

从总体上看,国内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概括为“实践导向”和“应用型”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双元制”(Duales Studium)是近年来另一个讨论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典型特征词。囿于研究资料的有限性,大多数的研究主要是建构在上述概念场域的比较和借鉴。更为重要的是,2011年,由教育部牵头,就我国部分地方院校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指导意见文本,文本的修订主要由几位对德国职业教育体系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完成,文本后来成为了《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底稿。可以说,不论在政策形成过程还是在政策的实质上,我国地方院校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国FH模式”的启发。一个由数个关键词组成的、具有学术界和政界共识的“德国FH模式”成为一种标的模式,成为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的政策原型和政策样板。^[16]随着地方院校转型工作的推进,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这种“大一统”的概念模式,似乎意味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就可以贴上“实践导向”、“应用型”、“工程教育”以及“双元制”等标签,反之,这些标签就意味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四、对“FH模式”的反诘——德国FH的个体差异性体现

在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模式化、概念化的叙述背后,是德国众多应用科学大学显示出鲜明的个体差异特征的现实,“应用型”、“实践导向”并不能全面、准确地概括出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独特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

从发展路径来看,有的FH由当时的工程师学校和工业学校改制而来,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专门学校和工场学校,如奥格斯堡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Augsburg—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第三大城市奥格

斯堡,其前身可追溯到1710年尚隶属于罗马帝国的奥格斯堡艺术学院(Reichsstädtische Kunstakademie Augsburg),在德国所有的FH中历史最为悠久;而有的则是上世纪70年代后陆续新建而成,原东德地区的应用科学大学更是在两德统一以后,由在苏联模式下建立的东德工程师学校和技师学院,仿照西德FH的模式陆续“升格”而成。

在专业设置尤其是特色专业的分布方面,各所学校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本校的特色专业往往与本地区经济的特色领域相关,如汉堡、吕贝克港口地区的航海专业,南部巴伐利亚地区的农业经济工程专业,经济重镇北威州地区的工商管理专业等,这些特色专业形成了各所学校在生源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从院校治理来看,《高等教育框架法》(Hochschulrahmengesetz)以及各联邦州的《高等教育法》(Hochschulgesetze)仅仅是规定了FH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对其办学方式和培养特色等并没有一致性的规定,德国各联邦州拥有教育立法的自主权。目前来看,在对FH的改革动向方面,除黑森州、北威州等少数地区外,在整个德国并未呈现出一体化、一致性的趋势。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院校治理仍是从院校内部出发,更多地体现出各院校的传统和大学管理者自身的理念和风格。

从应用科学大学最新的发展动态来看,“获得博士授予权”和“更改校名”是两个标志性的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仍然只是局部范围内的部分高校参与其中。2013年底,德国石荷州(Schleswig-Holstein)提出,计划在该州的应用科学大学中赋予其博士授予权,立刻引发了对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讨论。应用科学大学踊跃参与,综合性大学普遍反对,直到2016年10月,德国黑森州的富尔达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in Fulda)成为第一所获得博士授予权的应用科学大学。几乎与此同步,一批应用科学大学开始改名,将Fachhochschule改为Hochschule,去掉了“Fach”这个名称前缀后,似乎许多应用科学大学将其发展的定位越来越接近综合性大学,

有反对者认为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性大学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朝着“单一化高校的方向”(Richtung Einheitshochschule)发展。^[17]目前的动态显示,在应用科学大学发展思路上,德国社会各界一直对此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各个院校也出现了分化(Differenzierung),一部分学校主张应用科学大学在本质上就是大学,在学术研究上享受与综合性大学的同等地位,两者应该施以无差别的对待;而另一部分学校则认为应用科学大学应当保持并坚守其“重教学,轻科研;重实践,轻理论”的特色和传统,走与综合性大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五、对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

首先,从研究角度来看,与许多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研究一样,目前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研究基本上可以视作一种“宏大叙事”基础之上的教育研究,它主要基于管理学视角关注某种整体的教育模式,而极少关注个体(人、学校、决策者、精英)的差异性,这种宏观的研究思路难道是“必定妥当”的吗?按照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哲学意蕴,这种宏大叙事“缺乏生活图景中的个体生命故事,缺乏那些社会边缘发出的声音;它过多地强调了二元对立的立场,而忽略了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分层维度”。^[18]教育生活的复调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现实性,走入教育事实需要转换叙事风格,从而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19]繁复多变的中国教育状况,也要求我们善于转换研究视角,更多地关注个体与差异,才能得到更有价值、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借鉴研究,并不一定总要从总体层面进行制度移植式的比较性和策略性研究。如果能够将其作为一种教育现象或院校形态,从个体的角度去研究它的发展史或作为个体在“历史大潮”中的差异性特征和行为,可能会是一个较为新颖和独特的研究角度。

其次,承上,在我国目前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中,业

已形成了诸如“德国FH模式”、“德国工程教育模式”此类的话语体系。文献搜索表明,在德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没有对应的“Fachhochschule Modell”和“Ingenieurbildung Modell”这样的原始概念,这说明“德国FH模式”、“德国工程教育模式”很可能是域外研究者对德国FH发展情况的一个概括和总结,这些概念的客观性和指向性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考证。对于德国FH内部的教授和学生而言,“科研”还是“教学”或者“理论学习”还是“实践训练”并不是一个带有规制的指向性问题,而更多是出于自身实际的兴趣与选择。比照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基本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许多研究者很容易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概念学术”的迷思,将提出一个概念视为学术创新的标识,而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部分研究成果或沦为变相的舶来品或浸透着浓厚的排他主义。^[20]在实践层面,“德国FH模式”、“德国工程教育模式”成为国内有些与德国FH开展合作的院校得以提升竞争优势、获取资源和社会认可的策略性的标榜和营销噱头,而对于“德国FH模式”、“德国工程教育模式”这些概念本身,既缺乏明确、深入的表述(说不清楚),也没有鲜明、持续的实践形态(做得糊涂)。不可否认的是,“德国FH模式”、“德国工程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迷思”抑或是基于模仿(Mimesis)心理需求的“推销型概念”(Marketing concept)。^[21]

再次,如果我们将德国200多所应用科学大学的培养模式概括为“应用型”(Angewandt)和“实践导向型”(Praxisorientiert),这种忽略德国省州、区域以及院校差异的做法是否过于宽泛与笼统?在程式化、模块化的培养理念背后,追求的培养某种特质和能力的“标准人才”,这是一种基于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应激性策略,主张教育完全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在互联网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革新力量的带动下,未来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将更为全面,过度专门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不符合社会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2013年以来,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战

略，应用科学大学如何将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定位与之相契合，是摆在德国 FH 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迫切问题之一。

最后，众所周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其分层、分流式教育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如图 1 所示，德国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分化，进入不同类型的中学学习，而后再进入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通道。有研究表明，这种建立在分层形式上的教育机构分类加剧了德国社会阶层分化，家庭和出身更多地影响了孩子接受不同类型教育的几率，也影响了其日后的职业发展情况，^[22] 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教育机会不公正分布 (Soziale Ungleichheit der Bildungsmöglichkeiten)，^[23] 也一直受到各方的批评和争论，近年来，德国从联邦政府到各省州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取消文理考试成绩 (Abitur) 作为进入综合型大学 (Universität) 必要条件、赋予应用科学大

学更多的学术权等，可以视作对这一争论的回应。同理，在中国的社会场域下，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地方院校与“985”、“211”院校以及当下的“双一流”院校之间的序列差异性，无论是借鉴德国“FH 模式”还是德国“工程教育模式”，将某一类的学校培养的人才归结为某种特殊的类型，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阶层社会中社会分层的需要？换言之，“德国模式”应不应该“借鉴”？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是否应该在这个层面上受到社会伦理的制约？

六、余论——走出迷思，逃离“同一模式”陷阱

事实上，概念迷思不仅仅存在于借鉴德国 FH 模式这一方面，自百年以降，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西方模式”过度神话与概念迷思，对“西学”的阐释往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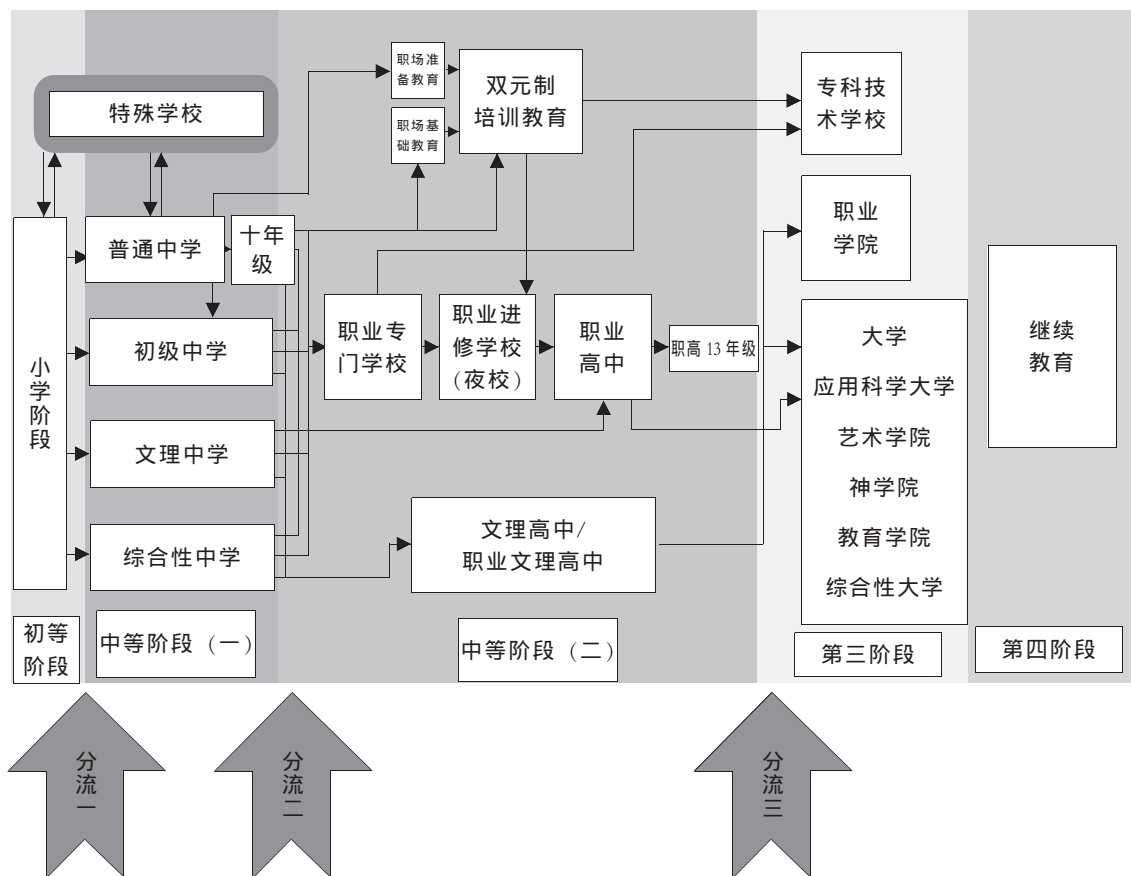


图 1 “分流分层式”的德国教育层级示意图^[24]

概念化、模式化的形式出现，在借鉴的过程中往往采用照搬和移植的方式。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如此，经常无可避免地落入“同一模式”的范式陷阱。前有“通识教育”，后有“大学排名”等概念和模式，无一不受到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追捧和炒作，种种同一化“模式”的背后，反映出研究领域的浅薄和急躁，实践的后果往往是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参与者的不安和无所适从。

中国的国情复杂程度唯当今世界之最，任何域外“模式”的借鉴和引入，如果缺少深入机理、注重全面和差异的本土化分析，便很难发挥预想的效果。紧跟着综合改革步伐，中国教育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建构具有多维价值体系、自下而上的、渐进的改良实践体系，是目前最迫切的需求。无论是教育的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需要更多的智慧和钻研精神，以理论代替概念，以方案代替模式，才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改革成果。

注释：

①这里的“模块”主要指置于共同教学目标之下的、包含一门或多门课程的教学单元。一个模块通常在一学期内完成，并仅通过一门共同考试对模块内的所有的课程进行考核。考试也可不参加，学生只需提供教师认可的资质证明。此外也可对多个模块进行统一的考核。对一个模块的说明以“模块手册”(Modulhandbuch)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应该要包括教学目标、时间安排(包括自学时间)、考试形式和参考书目等内容。见 Modul (Hochschule) [G/OL]. Wikipedia. [https://de.wikipedia.org/wiki/Modul_\(Hochschule\)](https://de.wikipedia.org/wiki/Modul_(Hochschule)).

参考文献：

[1] Hannes Berger, Lukas C. Gundling: Hochschulpolitik und Hochschulrecht. Am Beispiel des Landes Thüringen. Dr. Kovac, Hamburg 2015, ISBN 978-3-8300-8622-2, S. 86f.

[2] 徐理勤, 竺树声. 准确认识德国 Fachhochschule. [J]. 德国研究, 2001, (4): 63-

68.

[3] 李其龙. 西德的高等专科学校 [J]. 全球教育展望, 1979, (1): 9-15.

[4] 邱艳萍. 德国高专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启示 [J]. 陕西教育: 高教, 2014, (1): 145-146.

[5] Vgl. die deutschen Hochschulrahmengesetz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d.F. vom 26. Januar 2005, §1.

[6] 李好好, 卡尔-维尔海姆. 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 (Fachhochschule) 研究 [J]. 外国教育研究, 2002, (12): 32-36.

[7] 何俐芳. 德国教育体制探析 [J]. 旅游研究, 2003, 14 (2): 69-70.

[8] 孙崇文. 德国高等教育改革新走向——德国高校考察之一 [J].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 2006, (2): 19-22.

[9] 徐理勤. 论德国高等专科学校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 [J]. 外国教育研究, 1998, (4): 7-12.

[10] 徐理勤. 论联邦德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改革措施 [J]. 外国教育研究, 2002, (4): 42-45.

[11] 胡蕾蕾. 德国应用科技型大学的制度研究 [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12] 冯理政.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 (FH) 办学特色的分析与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13] 袁琳. 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1.

[14] Karl-Ernst Fichter. Neue Entwicklung an den deutschen Fachhochschulen [A].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首届中德论坛 (杭州) 文集 [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41-49.

[15] Lutz Jähnig. Die neue Hochschule - Entwicklung und Perspektiven der 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 [A].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首届中德论坛 (杭州) 文集 [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39-151.

[16] 董大奎. 德国 FH 模式对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启示 [J]. 江苏教育, 2015, (24):

13-16.

[17] Joybrato Mukherjee. Nein zur Einheitshochschule. [EB/OL]. <http://www.forschung-und-lehre.de/wordpress/?p=19318>, 2015-09-09.

[18] 王福民. 论唯物史观的日常生活转向[J]. 学术研究, 2011, (5): 24-30.

[19] 葛孝亿. 论教育叙事的复调写作——基于巴赫金文论的视角[J]. 教育学术月刊, 2015, (8): 20-25.

[20] 陈占江. 重返费孝通: 走出“概念学术”的迷思[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4-24 (A08).

[21] Webster F E, Institute M S. Rediscovering the Marketing Concept [J]. Business Horizons, 1988, 31 (3): 29-39.

[22] Michael Borchard, Christine Henry-Huthmacher, Tanja Merkle M.A., Carsten Wippermann: Eltern unter Druck-Selbstverständnisse, Befindlichkeiten und Bedürfnisse von Eltern in Vers-

chiedenen Lebenswelten. Berlin 2008, ISBN 978-3-8282-0424-9 (Hrsg.: Konrad-Adenauer-Stiftung).

[23] Deutschland scheint auf dem Weg in eine neue Art von Klassengesellschaft zu sein, wobei die Trennungslinie eben nicht nur über Einkommen und Vermögen, sondern auch über kulturelle Dimensionen wie etwa Bildungskapital und Bildungaspirationen, aber auch Werte und Alltagsästhetik verläuft. In: Michael Borchard, Christine Henry-Huthmacher, Tanja Merkle M.A., Carsten Wippermann: Eltern unter Druck. S. 8.

[24] 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 (Hrsg.). Bildungsorte und Lernwel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B/OL]. <http://www.bildungsbericht.de/de/bildungsberichte-seit-2006/bildungsbericht-2016/pdf-bildungsbericht-2016/bildungsbericht-2016>, 2016-07-13.

(责任编辑 田晓苗)

Getting Rid of Oneness Concept Model Myth --Reconsideration on the German FH Talent Training Model

Wang Zhaoyi Zheng Youqu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FH) is the main force of engineering talents training in Germany. The FH model based on its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training has been the hot topic at present. Learning from the FH mod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cus point of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form, especially for the local ones. Behind the upsurge of learning from the German FH model, there are myths and misuses, and the term of model itself has become a rhetoric of homogenization and labelism.

Key words: German FH; Talent training mode; Conception myths; Universitie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